

詹安泰全集

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詹安泰全集



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

翰生曾兄先生著書，為字楷一東，并達。唐草食家，欲
謬為氣。

州間之幸。友人僑字願君，幼齡如學，以錄所修書，筆
羽發見，亦頗可觀。若古聲字，或可云實詞也。為稿
每每硬骨太寬，未能完卷。刻先整理花外集，後
脫筆一節，即行錄奉，容一月，附呈乞

教，亦不

謬為氣

十月廿九日
詹安泰

出版說明

詹安泰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在文學理論研究、古典文學作品鑒賞及詩詞創作等領域均有傑出成就，發表過許多有關古典文學的專著和大量論文，在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至今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出版時間久遠，原書流傳稀少，不易覓求，爲滿足專業工作者和古典文學愛好者的需求，本社推出這部《詹安泰全集》。

《全集》收錄了詹先生現存的各類著述，包括其生前親自編訂出版及後人輯錄而成的專著六部，編者新輯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的論文五十餘篇，旁及友朋往來的信札等，並按文體分類編排，是迄今爲止最爲完備的詹安泰論著總集。

所收文稿，均依據最早或最可靠的版本整理校訂。由於各書內容體裁有別，體例未盡統一，爲保留原著的面貌，除改正明顯的文字訛誤、引文差錯等，其他一般不作改動，對於一些不盡符合今日習慣用法的富有時代特色及作者語言風格的表述均予以保留。

本卷收錄詹安泰歷年所作文史論文及往來書信，另附傳略、年譜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十月

目錄

關於處理古典文學的一些意見	一
談談怎樣對待優秀古典文學	一六
對我國目前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意見	二五
學習蘇聯文學理論對於我們古典文學教學的一些體會	三〇
答陳培治同志	三七
編寫《中國文學史》的一些經驗和體會	四一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一九五三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紀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五三
論屈原的階級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學上的作用	五九
孟浩然評傳	九四
楊髡發陵考辨	一二〇
本色略談	一四五
談文采	一四八
夜讀偶記	一五一
小談《水滸全傳》	一五一

朱熹的《論文》及其他·····	一五二
從《桃花源記》說起·····	一五三
看古人改稿·····	一五四
也有一點感想·····	一五六
蘇舜欽的《大小言》·····	一五八
望文生義·····	一五九
詞的欣賞和創作·····	一六一
清除胡適反動思想對祖國古典文學遺產的毒害·····	一七〇
批判胡適所謂「科學的方法」及其他·····	一八五
讀毛主席詩詞——有關藝術特徵的一點體會·····	一九七
革命的最強音·····	二一三
佚詩信札·····	二一九
題贈蔡起賢聯·····	二一九
題戴貞素《聽鵲樓詩草》·····	二一九
挽石銘吾先生·····	二一九
致龍榆生(三通)·····	二二〇
致陳中凡(一通)·····	二二一

致楊樹達(一通)·····	二二二
致羅香林(二通)·····	二二三
致劉百端(二通)·····	二二四
【附錄一】傳略評述·····	二二五
我的父親詹安泰(詹伯慧)·····	二二五
紀念詞學家詹安泰先生(秦牧)·····	二四四
春風杖履失追陪(蔡起賢)·····	二四六
仰念詹安泰先生(湯擎民)·····	二五二
永遠懷念的追記(邱世友)·····	二五七
詹安泰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黃天驥)·····	二七〇
懷念導師詹安泰先生(鄭孟彤)·····	二七九
憶詹安泰老師(周偉民)·····	二八三
拜師四年(唐玲玲)·····	二八八
我的姨丈——詹安泰教授(鄭良樹)·····	二九二
中國詞學文化學的奠基人——民國四大詞人之四：詹安泰(施議對)·····	二九六
【附錄二】題詞、序跋·····	三五八
題詹安泰教授紀念專集(吳南生)·····	三五八

題詹安泰詞學論稿(王力)	三五八
題詞(陳鍾凡)	三五八
題无龔詞(夏承燾)	三五九
浣溪沙題无著龔詞(唐圭璋)	三五九
讀祝南先生遺著(饒宗頤)	三五九
祝南先生遺集爲伯慧題(程千帆)	三六〇
臺城路寄題祝南老弟《鵲鵲巢詩集》即用其題高吹萬《風雨勘詩圖》韻(溫廷敬)	三六〇
高陽臺題《无龔詞》用韓子耕韻(李崇綱)	三六〇
爲祝南題漱宋室填詞圖(陳寂)	三六一
憶舊无龔詩詞原稿影印行世感成(黃海章)	三六一
滿江紅讀詹安泰先生劫餘論著感賦(王季思)	三六一
詩二首(陳湛銓)	三六二
懷舊八韻敬題无龔師紀念論文集(羅忼烈)	三六四
拜讀詹安泰教授詩詞感賦(曾敏之)	三六四
題詞(賴少其)	三六五
題詹安泰黃君坦二公詞札(張縵龔)	三六五
讀鵲鵲巢詩聞亂憶香港諸親友有感即用其韻(清水茂)	三六五

【附錄三】年譜、著述年表	三六六
詹安泰先生年譜（鄭曉燕）	三六六
詹安泰著述年表（詹伯慧編製 左鵬軍增補）	四四三
後記	四五七

關於處理古典文學的一些意見

一

處理古典文學也如處理其他的問題一樣，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之下來進行，纔能獲得正確的結論。這是十分明白的。可是，由於古典文學是歷史上的產物，它既可能具有超越它的歷史時代的「長久的存在」的價值，同時又不能不受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所限制，這就使得它成為更加複雜而不易處理的問題。據我的瞭解，在處理古典文學的時候，往往會犯這樣的錯誤（至少我是曾經犯過這種錯誤的）：或者對古典文學家作過分的要求，即向他們提出在他們的時代裏所不能做到的要求；或者對古典文學存狹隘的偏見，即只看到進步作家生活的一面或進步作品產生的一面。而這兩者都是主觀片面的看法，都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這是值得提出來談一談的。

二

毛主席在《實踐論》裏面說：「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這種唯物地辯證地對理論認識的明確的指示，對於我們處理古典

文學來說也是完全適用的。我們應該深刻體會這種論點，根據這種論點來評價古典文學，纔不會迷失方向，走上反歷史主義的道路。

向古典文學家提出過高的要求的人們，可能對這點沒有注意到或注意得很不够。

大家知道，文學藝術服從於政治，創作方法服從於世界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最基本的原則。我國古典文學絕大部分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封建社會的真正具有忠實於客觀求真的要求和真正看到了矛盾鬥爭的社會實質的作家，在他的創作中也可能突破爲他的階級所限制的世界觀而達到對於現實的真實的描寫，但較之今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必須服從人民的政治，服從工人階級的世界觀。而封建社會的古典作家還無這種實踐，還無這種認識，因而他們的創作，雖可能擺脫本階級的束縛乃至爲了另一階級的利益而向本階級進行無情的鬥爭，但這是或激於正義，或堅持真理而出此，並不是就等於具有了工人階級的世界觀（當時尚無此先進階級）。前者和後者各有其時代的特徵，各有其具體的歷史條件，是不能用同一的標準來衡量的。用同一的標準來衡量不同時代的作品，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評價。過去那些傑出的作家，雖然有他們的世界觀的歷史條件的限制，雖然有他們自己的某些不可避免的偏見，但他們能够運用完整的藝術形式，在作品裏的某些方面反映了有利於人民大眾及國家民族的思想，如對廣大人民的生活的忠實反映，對反動階級內部矛盾的揭發，對統治集團的血腥罪行或腐爛生活的暴露，對通敵賣國的敗類們的可耻行爲的抗爭，對偉大理想的熱望與堅持等等。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破壞舊基礎、幫助了當時人民革命鬥爭事業的作用，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歷史前進。他們這種對於祖國

的歷史文化上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舉例來說，如杜甫、白居易都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詩人，這是大家公認的。杜甫的「三吏」、「三別」、《兵車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等，都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作了具體而深刻的描寫，對農民大眾遭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對統治集團作了有力的諷刺或嚴厲的抨擊。雖然他們的主要意圖，是希望統治集團改變統治的策略以安定他們的社會秩序，可能產生緩和階級鬥爭和延續反動統治政權的副作用；但同時他們具有相對的正義感，抱有改善農民大眾生活的願望而作為嚴重的問題向統治集團提出，這就可以加深人們對反動統治的罪惡行為的認識，對階級對立的不可調和性的認識，甚至可以激起農民大眾革命鬥爭的熱情（雖然在當時未必具體表現出來）。這種進步的意義，也是應該肯定的。我們不能以其只從改良當時的政治的觀點出發，以其「只看到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的整個的尖銳面，但它不曾看到也不能看到這些矛盾的出路」，而否定他們在當時的進步性。

又如中唐詩人李紳的《憫農》二首：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稍後的詩人聶夷中的《傷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劓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這種有意識的誇張和很突出的刻畫，特別是《憫農》第一首和《傷田家》的「剝肉補瘡」等，就極其忠實地反映了被殘酷剝削的農民大眾的慘痛生活，充滿了對農民大眾的同情和對統治階級的憎恨的心理。這就表現了千百萬人民大眾對殘暴的剝削者的抗議和鬥爭的思想情感，在當時和以後都有感動人的力量。我們也不能以作者只從舊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只向封建統治者作無原則的呼吁，並沒有明確指出革命的途徑，不適合於現代的革命需求，因而否定他們的進步意義。

又如金代趙元的《修城去》：

「修城去！」勞復勞，途中哀歎聲嗷嗷，幾年備外敵，築城恐不高；城高慮未固，城外三重壕。一鋤復一杵，瀝盡民脂膏！脂膏盡，猶不辭，本期有難牢護之。一朝敵至任椎擊，外無強援中不支；傾城十萬戶，屠滅無移時。

敵兵出境已逾月，風吹未乾城下血，百死之餘能幾人？鞭背驅行補城缺。「修城去！」相對泣，一身赴役家無食！城根運土到城頭，補城殘缺終何益？君不見得一李勣賢長城，莫道世間無李勣。一方面把統治階級盡量剝奪人民大眾的勞動力及其無耻、畏縮、不敢抗敵的怯弱腐朽本質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來；一方面把勞動人民具有堅強抗敵的信心，具有高度愛國主義的思想和情緒，以及他們橫遭統治階級凶殘迫害的情況和他們憤恨統治階級的心理作了深入而生動的描寫。通過這種具體的形象，不但使人可以很明確地看到階級社會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面貌和實質，還體現出勞動人民的抗敵衛國的高貴品質是如何值得人們敬愛。我們更不能以其沒有領導和組織人民革命鬥爭的思想意識而把對抗敵人的辦法放在「英雄豪傑」的身上，就否定了它所具有的若干進步的因素。

上面只就一些古典作家直接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中舉些例子來略加說明。

古典文學中具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其進步意義，雖然在濃度和深度上要受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制，不可能完全符合於現在的人民文學的標準；但它和現在的人民文學尚有其一定限度的歷史性的聯繫，也是可以指出的。過去的愛國主義思想雖不同於今日的愛國主義思想，但是抵抗敵人侵略，要求改良政治措施，同情勞動人民被壓迫剝削的痛苦，表現勞動人民的創造的智慧、善良的性格，和塑造勞動人民為現實生活而鬥爭的勤勞、勇敢、堅強不屈的形象，這些地方，與今日的愛國主義的爭取和平，熱愛新制度，鼓舞人民為解放而鬥爭，歌頌勞動模範和戰鬥英雄，基本精神是不相違背的。這裏面就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血緣關係。我們祖國三千年來的文學遺產自《詩經》起，偉大的文學作家自屈原起，所具有的這種人民性與現實主義精神的極其優秀的傳統，一直灌注到現在。我們指出並發揚它，把它和新中國的創造事業很好地聯繫起來，作為哺育新文學力量的養料之一；同時在這個基礎上也就可以為未來的文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毛主席曾教導我們說：「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新民主主義論》）假如我們因為過去的優秀文學遺產不能完全符合今日的要求就置之不理，甚或加以惡意的誣蔑，那就不僅是反歷史主義的觀點，而是反愛國主義的態度了。

三

受着階級地位所限制的封建社會的古典作家（包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典作家），為什麼又會寫

出具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進步作品來呢？這一點，我認爲也有闡明的必要。

馮雪峯同志在其所著的《中國文學中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輪廓》中，指出階級社會的作家的時代性和階級性都不能不通過矛盾性表現出來，這矛盾性就是產生進步作家的主要特徵。這見解我認爲是正確的。我現在在和他同一的結論中再提出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

大家知道，在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存在着特別複雜的矛盾因素：除了封建地主對直接生產者——農民、農奴和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所形成的階級矛盾之外，封建地主內部各階層的矛盾情況也極爲顯著，還不時發生民族的矛盾，而且這幾種矛盾往往是互相交織着。一個具有創作天才的作家處在這樣的充滿矛盾鬥爭的客觀現實中，是不能孤立起來或完全避開而不受客觀現實的影響的。他的生活實踐、思想情感乃至階級立場都可能因客觀現實的矛盾而發生變化；客觀現實的矛盾越達到尖銳化時，也可能加甚他變化的速度和深度，直至「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着它的對立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矛盾論》）。因此，在階級社會裏，一般地說，客觀現實的矛盾鬥爭較爲複雜較爲尖銳的時候，也即是進步作家較易產生的時候。反之，封建時代所謂「太平盛世」，是統治權較爲鞏固，一切矛盾都不易達到表象化的時候，也即是進步作家較不易產生的時候。客觀現實的矛盾鬥爭的急劇進行，或陷於相對的靜止的狀態，是檢驗產生大量或少數進步作家的相當有效的尺度（當然不能看成絕對有效的尺度）。這理由，我想從下面一些具體情況來說明：

封建社會的古典作家大都是士大夫階層中的人，他們可以不參加體力勞動而坐享勞動人民勞動的成果。當那所謂「太平盛世」的時候，也即是客觀現實的矛盾鬥爭在力量對比之下還處於相對靜止

階段的時候，他們因其階級地位比較優越和物質生活比較豐裕，就可以不必正視現實而從事精神上的活動。他們對於對立階級即人民大眾的生活情況既沒有必要去接觸它，當然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對它有什麼深刻的表現（像五代時顏仁郁爲歸德場長，專管農事，寫了反映農民生活的詩一百篇，那是在特殊的地點、條件中產生的情況），因而也不易（並不是不會）引起對本階級的不滿心情而把階級內部的醜惡面貌揭露出來。但這並不等於說矛盾鬥爭的因素已經不存在。按照客觀現實事物發展的規律，一切過程都是矛盾鬥爭的過程。當着矛盾鬥爭達到某一種更高的階段，矛盾諸方面已發生顯著的變化，他們精神上的活動已無法解決現實中的矛盾的時候，就不得不被迫着放棄唯心的觀點去面對現實、參加現實，甚至於投靠新生的力量來解決現實的矛盾了。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就最有產生進步作家的可能。這是一種情況。這情況是受客觀現實所決定的。

封建社會的士大夫，一般雖屬於統治階級，但和當時的統治集團比較起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力量是不強固的。他們一方面以自己的階級地位來剝削壓迫人民大眾，一方面在地租的轉嫁和等級的歧視上也要受到比他們更高的統治者的壓制。這樣，就使得他們以雙重態度對付他們當時的社會；有時候和統治集團妥協乃至擁護當時的統治政權；有時候也敵視統治集團乃至同情對立階級向統治集團進行鬥爭。這又是一種情況。這情況是普遍存在着的，也是受客觀現實所決定的。

高爾基曾指出過，一個作家總比別人更飽和着經驗——人生底知識；一個具有豐富經驗的作家總是自相矛盾的，因爲豐富的經驗要求着一些廣大群眾的、有組織的思想，而這些思想是與集團和階

級底狹隘的目的敵對着的（見《俄國文學史序》）。這情況在文學歷史上時常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作家，由於自己的階級地位的關係，對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情況就比較熟悉；又由於自己的感覺比較銳敏和觀察比較深入，就很容易對統治階級那種不合理的陰謀和措施感到不滿而引起階級情感的分裂。這情況在文學歷史上也時常可以看到。這兩種情況，都顯示出客觀現實的矛盾在古典作家的思想感情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作用就可以加強他們的矛盾鬥爭的力量，促使他們「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

就古典作家由消極走向積極的矛盾鬥爭的發展過程看，就古典作家所具有的矛盾鬥爭的積極因素看，當時客觀現實的矛盾鬥爭都是決定古典作家從矛盾鬥爭中前進的原動力。

我們從中國文學的歷史上檢閱一下，那些傑出的作家，自屈原、司馬遷以下，如漢魏之際的蔡琰、王粲、曹植，晉宋之間的劉琨、陶潛、鮑照，天寶亂後的杜甫、白居易，南北宋之交及南宋初期的辛棄疾、張孝祥、陸游，宋元交替時期的文天祥、鄭思肖、謝翱、鄧牧，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黃宗羲、屈大均、呂留良等等，幾乎都是客觀現實的矛盾鬥爭比較深化劇烈時期產生的。我們從矛盾鬥爭的情況比較突出的客觀現實來考察古典作家的生活實踐，從古典作家的生活實踐來檢驗他的作品的精神實質，是處理古典文學的一條可以走得通的途徑。這麼一來，我們說客觀現實的矛盾鬥爭的深刻化和尖銳化是產生進步作家的主要特徵之一，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可是，我們也不能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化。當矛盾鬥爭在相對的靜止的階段，也只是一般的內部的關係相對的不變，但某些部分的對立關係的變化仍然是存在的。就中國的封建社會說，各地的具體